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

——基于社会资本重构视角的分析

欧雪辉, 曾福生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新时代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创新发展模式, 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社会资本重构-乡村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 利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微观数据, 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乡村治理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显著提高了农户对乡村治理的满意度, 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 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和规范共享是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治理效应的有效路径。因此, 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需要建立以信任机制为基础, 社会网络为载体, 规范体系为保障的制度路径。

关键词: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乡村治理效应; 政治信任; 政治参与; 规范共享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5)04-0049-07

The governance effects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reconstruction

OU Xuehui, ZENG Fu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epresent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explor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serving as an effective vehicle and crucial catalyst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city.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social capital reconstruction-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governanc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micro-level data from the 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CL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rural governance,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s robust even after addressing potential endogeneity. Mechanism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normative consensus constitute effectiv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governance effects are realized. Therefore, to enhance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it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 institutional pathways centered on trust-building mechanisms, supported by social networks and safeguarded by a normative system.

Keywords: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ural governance effects;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ormative systems

收稿日期: 2025-02-27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项目
(XSP2025WT001)

作者简介: 欧雪辉(1988—), 女, 湖南益阳人, 博士
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201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

见》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到2035年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①。近些年来,乡村治理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1],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等结构性困境,乡村治理陷入内生权威缺乏和外生权威弱化的双重困境^[2]。另一方面,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全面衰落^[3]。因此,如何促进农村社会有效治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4-6]。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旨在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以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为重点任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②。这是中央首次提出“新型集体经济”概念。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出台,要求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③。2024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指出,要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④。可见,在政策层面已明确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否激活村民自治制度?能否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学界围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促进乡村治理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促进组织聚变,提升村级组织的领导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继承与创新,它有助于完善村级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政治功能^[7],提升农村集体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村级经济的独立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嵌于乡村社

会和乡土网络,具有联结多方主体的制度优势^[8]。通过与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合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整合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着纽带作用^[9]。二是带动农户参与,提升村级组织的公信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激活了农户在乡村发展中的主体性^[10,11]。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严格的程序规制了村级组织权力,赋予了农民更多参与权利^[12],使他们能够更多地参与村庄的经济事务,增强了集体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平性^[13]。同时,通过合适的机制促成农民合作也是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的重要途径^[14]。三是完善利益分配,提升村级组织的向心力。一方面,随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体量已初具规模,增强了村级组织的经济保障功能^[15]。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再分配为农户提供了公共福利保障,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弥补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16]。总的来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新时代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探索出的一种创新模式,它通过整合村级资源、提高集体资产的利用效率,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⑤。现有研究主要遵循“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来论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组织与群众互动的关注较少,更缺乏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视角来观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事实上,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众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和认同^[17],这不仅是农户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也是衡量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18]。为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通过提高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和规范共享来改善乡村治理绩效,以进一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在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村级组织由于资源匮乏、管理能力不足,往往难以赢得农户的信任和支持。不少学者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改变这一状况提供了新的契机^[19-21]。现有关于乡村治

理的研究中,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高度的耦合性^[22],为此本文构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社会资本重塑-乡村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图1),以更好地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区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特殊资源,根植于社会内部关系网络,是解决合作困境的一种有效机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重塑农村的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效应。具体而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任联结、网络重塑和规范共享三个方面。一是信任联结。信任是社会资本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提升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资源可以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营造。农村集体资产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经济互惠强化了信任基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叙事,重构了“集体-个人”的关系认知。通过土地入股、利润共享等机制,村民成为利益共同体,打破了个体“原子化”的困境,形成了基于经济契约的信任纽带。此外,透明化运作提升了村级组织的公信力。集体经济组织的“四议两公开”制度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政府-村集体-农户的委托代理关系趋向稳定,促进了个体对基层组织的信任。二是网络重塑。社会资本只有嵌入一定的社会网络才能发挥作用,培育“稠密”的社区关系网络有助于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重构了横向网络,集体经济合作社成为村民议事平台,将分散的农户纳入组织化协商体系,增强了横向社会资本的密度。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延伸了纵向网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搭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协作通道,优化了政策执行效率,增强了纵向社会资本的协调度。三是规范共享。社会资本理论中的规范是一种普遍互惠规范,所解决的是集体行动中利己与利他均衡的问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规范化的章程(如成员代表大会制度、财务公开制度、土地流转协议等)建立程序正义,将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的人情纽带转向基于契约和规则的现代治理。这一过程并非完全排斥人情,而是通过契约精神划定行为底线、规范利益边界,从而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

种公共治理资源,在高度社会关联的乡土社会中,有助于打破固有的社会关系,重构信任、网络与规范等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23]。在新的治理秩序下,信任联结、网络重塑与规范共享可以有效改善村级组织动员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增强乡土社会的合作精神,为优化乡村治理奠定了社会基础。同时,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增强村级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提供了物质保障,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治理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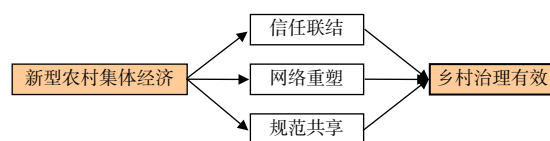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南京农业大学乡村振兴数据资源平台公开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CLES)数据库。调查内容涉及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村集体经济、土地流转和基层治理等信息。该数据库覆盖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52个行政村,共计2 600个样本农户,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方法进行抽样。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中各村人口占实际人口规模的比例,采用不等概率抽样方法,每个城市抽取2个区县进行调研。然后依据区县内行政村的数量比例,使用不等概率抽样选取2个乡镇,并从每个乡镇中确定1个行政村,共有52个行政村被纳入调研。最后利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各调研村中抽取50户农户作为样本。本文利用2020年和2021年的调查数据,共涉及5 048个家庭和100个村庄样本。在对数据进行清洗合并之后,最终获得4 970个研究样本。

(二) 模型设定

为研究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效果满意度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Groven_{it} = \beta_0 + \beta_1 Collective_{it} + \beta_2 X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其中, $Groven_{it}$ 表示第 i 个农户在第 t 年对于乡村治理效果的评价, $Collective_{it}$ 为第 i 个农户所在村

庄第 t 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β_1 为衡量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对村庄治理效果评价的待估参数, 若 β_1 显著为正, 则表明集体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X_{it} 为控制变量向量组, β_2 为对应的待估参数向量。 μ_i 为个体虚拟变量, 以控制个体层面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个人的影响, v_t 为时间虚拟变量, 以控制时间趋势的影响。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表示其他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 本文的因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 因此采用Ologit模型进行估计。

（三）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对乡村治理的满意度。 参考张会吉等^[24]的研究, 将农户对于乡村治理满意度分为“非常不满意、比较满意、一般、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依次赋值为1、2、3、4、5。 赋值越高, 说明农户对于乡村治理效果的满意度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借鉴栾健和张哲晰^[25]的研究, 本文选取当年村集体经济的总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本文从个体、家庭两个层面设置控制变量。 其中, 个体层面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 家庭层面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和家中是否有干部。 并将标准误聚类在村一级。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和规范共享。 政治信任主要通过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来刻画。 将“很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和很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 数值越大, 说明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 基层民主选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26], 本文采用样本家庭在本村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情况来刻画农户的政治参与。 若农户对村庄的认同感越强, 就越会关心集体和村庄的公共事务, 越可能参加投票选举等政治性的集体活动。 如果样本农户的家庭成员参与了投票则赋值为1, 如果没有则赋值为0。 规范共享选取“是否有村规民约”测量, 村规民约是村庄公共治理中制度规则的集中体现, 是实现村庄规范化治理的重要制度, 其存在与执行情况直接反映了村庄内部规范共识的形成情况^[27]。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具体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乡村治理满意度	4 956	3.888	0.761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4 970	13.882	2.960
户主性别	4 911	0.925	0.264
户主年龄	4 970	63.024	10.693
户主受教育年限	4 919	8.017	28.506
家庭规模	4 970	4.124	1.811
家庭收入(对数)	4 970	7.833	3.519
家中是否有干部	4 967	0.153	0.360
到最近高速路口距离	4 970	13.051	16.345
村人均收入	4 970	9.909	0.589
村庄人口	4 970	2 509.261	1 972.140
政治信任	4 966	4.051	0.815
政治参与	4 922	0.784	0.411
规范共享	4 970	0.702	0.457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分别汇报了三种不同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 研究发现,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在混合回归、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中均显著为正。 列(1)混合模型回归结果表明,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 乡村治理满意度上升的发生比率将增加0.011个单位。 列(2)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 集体经济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混合模型 回归结果	随机效应 回归结果	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0.011** (0.0109)	0.008* (0.010)	0.016*** (0.010)
户主性别	0.102 (0.022)	0.002 (0.001)	-0.127 (0.117)
户主年龄	-0.011*** (0.003)	-0.001*** (0.001)	-0.001*** (0.001)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家庭规模	-0.000 (0.005)	-0.000 (0.001)	-0.004 (0.006)
家庭收入	0.021*** (0.010)	0.009** (0.004)	0.008** (0.004)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²	0.112	0.142	0.101
AIC/BIC	-	3 586.231/ 3 663.924	3 521.115/ 3 598.847
N	4 888	4 888	4 888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下同。

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乡村治理满意度上升的发生比率将增加0.008个单位。列（3）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乡村治理满意度上升的发生比率将增加0.016个单位。因此，上述结果均说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提升村庄治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各个模型中变化不大，表明无论是在控制不同的固定效应还是在假设随机误差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的影响都是稳健的。

（二）内生性分析

为尽可能避免内生性的影响，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是通过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以匹配农户所在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降低因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估计偏差。具体来说，本文将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处理变量，通过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所在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倾向得分估计，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将农户进行匹配。为了确保实验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对照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其他特征上尽可能一致，本文使用了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等多种方法来进行匹配。

从表3可知，匹配前实验组的农户对乡村治理满意度为2.034，而对照组为2.162，平均处理效应为0.0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t 值为1.670）。匹配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满意度上的显著差异表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与较低的村庄在其他特征上可能存在差异，需要通过匹配来减少这些偏误的影响。匹配后，通过最近邻匹配方法，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满意度分别为2.034和2.150，平均处理效应提高至0.003，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半径匹配的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平均满意度依然为2.034，对照组为2.141，平均处理效应为0.00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核匹配方法的结果与前两种方法相似，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满意度分别为2.034和2.145，平均处理效应为0.003，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PSM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潜在的选择偏误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且各匹配方法的结果一致，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3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匹配方法	实验组	对照组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t 值
匹配前	2.034	2.162	0.002***	0.001	1.670
最近邻匹配	2.034	2.150	0.003**	0.001	2.000
半径匹配	2.034	2.141	0.003***	0.001	1.920
核匹配	2.034	2.145	0.003**	0.001	2.000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选取县域内其他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因为县域内各村庄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互动关系，其他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地区间的带动效应或资源共享效应，间接影响村集体经济发展，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县域内其他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不直接作用于本村居民对于乡村治理效果的评价，这使其在模型中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因此，这一工具变量可以较好地消除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差。为此，本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模型估计。从表4可知，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县域内其他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对目标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002，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该工具变量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统计量为35.547，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工具变量的强度较高，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第二阶段回归中，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治理满意度的系数为0.00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集体经济发展对乡村治理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并说明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小。总的来说，工具变量法的结果与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一致，说明集体经济发展在提升农户对乡村治理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表4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	0.003** (0.001)
其他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0.002** (0.001)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弱工具变量检验	35.547***	—
N	3 023	

(三) 机制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选取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和规范共享变量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之间的作用。表5列(1)结果可知,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表明,集体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究其原因:一是集体经济通过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使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展现出更强的领导力和服务能力,从而增强了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二是村干部通过整合资源和利用集体经济的收益改善民生,有助于提升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公信力和威望;三是发展集体经济为村干部提供了更多与外部资源对接的机会,通过与政府、企业、乡贤等外部主体的合作,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表5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之间显著为正。这表明,集体经济发展显著增强了农户的政治参与。究其原因:一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增强农户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意味着农户更加愿意融入村庄的社会结构中,并积极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治理;二是村庄认同感有助于形成集体意识,进而促使村民合作共赢。这种集体意识不仅促进了村民对村级治理的支持,还使得村庄在面对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时更具凝聚力。表5列(3)显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规范共享之间显著为正,同样说明集体经济发展通过制度建设促进了“规范共享”,进一步夯实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以村规民约、股份章程、土地流转协议为代表的规范体系建设,使村庄治理从“关系型”“经验型”逐步转向“契约型”“规则型”^[28]。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依托正式的治理制度,如“四议两公开”、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等,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议事规则,增强了村民对制度执行的认同感^[4]。另一方面,财务公开、土地流转合同等制度化举措降低了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重塑了农户与集体、与干部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了基于程序正义与规范互惠的治理结构^[29]。在此基础上,规范共享不仅提升了村级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也增强了治理秩序的可持续性与村民行为的内生约束力,从而实现了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层耦合。

表5 机制检验结果

	政治信任	政治参与	规范共享
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0.001*** (0.010)	0.003*** (0.004)	0.002** (0.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4 888	4 888	4 88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社会资本重构-乡村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显著提高了农户对乡村治理的满意度,多种检验均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提高农户的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和规范共享是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治理效应的有效路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从社会资本重塑角度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乡村治理效应需要建立以信任机制为基础,社会网络为载体,规范体系为保障的制度路径。为此,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构建参与式治理机制,激活内生动力。通过“三变”改革等制度供给,强化农民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完善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明确村民对集体经济发展中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形成“理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成员代表大会审议”的治理框架,强化村民对集体经济运作的信任基础。二是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构建“党建+集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加强村支“两委”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培训提高村“两委”干部、党员和群众综合素质,大力培养致富带头人,推动思想上提神增智,行动上提质增效。三是构建“正式治理+非正式网络”的协同治理模式。建立乡贤党建联盟,吸纳乡贤、技术专家等外部人才建立集体经济发展顾问团,既发挥党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又激活非正式组织在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中的“黏合剂”作用。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6>

/23/content_5402625.htm。

- ②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2/29/content_5154592.htm。
- ③ 资料来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338.htm。
- ④ 资料来源:《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8.html。
- ⑤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sid_for_share=80113_22。

参考文献:

- [1] 蔡昉. 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么?[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9): 2-13.
- [2] 白现军, 张长立. 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11): 82-87.
- [3] 王亚华, 高瑞, 孟庆国. 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1(2): 23-29.
- [4] 衡霞.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 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能——以四川省彭州市13镇街为例[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2): 137-144.
- [5] 王禾, 宗成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S省L县的经验分析[J]. 世界农业, 2025(3): 82-93.
- [6] 陈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经验与启示[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11): 10-16, 108.
- [7] 高鸣, 芦千文.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 70年发展历程与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0): 19-39.
- [8] 许中缘, 肖佳欣, 夏沁. 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集体经济利益联结机制重构: 实践模式、运行机理与保障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5(2): 24-37.
- [9] 周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以“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模式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11): 16-24.
- [10] 公茂刚, 张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农民主体地位实现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8): 73-86.
- [11] 郭庆海. 小农户: 属性、类型、经营状态及其与现代农业衔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6): 25-37.
- [12] 胡平江, 刘硕. 程序赋权: 集体产权改革中的农民参与及其权利阶梯——基于山东省两个村庄的微观政治过程考察[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25-33.
- [13] 赵翠萍, 侯鹏, 刘阳, 等. 传统农耕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践——豫省L村案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12): 86-94.
- [14] 王辉, 金子健.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治理和社会连带机制——浙江何斯路村草根休闲合作社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7): 18-37.
- [15] 李林峰, 饶静. 正义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及其功能研究——以浙西北H县为例[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5): 103-116, 118.
- [16] 唐丽霞.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基于浙江省桐乡市的实地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4): 143-150.
- [17] 徐卫华.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2(2): 57-68, 127.
- [18] 潘博, 王立峰.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化解路径——以社会资本为分析视角[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5): 110-117.
- [19] 徐勇, 赵德健. 创新集体: 对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54(1): 1-8.
- [20] 程郁, 万麒麟. 集体经济组织的内外治理机制——基于贵州省湄潭县3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案例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6): 43-52.
- [21] 谢宗藩, 肖媚, 王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嬗变: 嵌入性视角下发展动力机制变迁[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12): 92-103.
- [22] 张立荣, 冉鹏程. 社会资本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分析与出路探寻——以恩施州利川市律师事务所参与乡村治理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57(4): 12-18.
- [23] 向楠, 乐章.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 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3): 114-127.
- [24] 张会吉, 薛桂霞, 陈静.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9169份调查问卷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12): 214-225.
- [25] 栾健, 张哲晰. 兼顾效率与公平: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经济学家, 2024(01): 118-128.
- [26] 刘振滨, 林丽梅, 郑逸芳. 生活幸福感、政治认知与农民选举参与行为[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7(5): 88-95.
- [27] 罗博文, 孙琳琳, 张珩, 等. 村干部职务行为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来自陕陕滇黔四省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3): 162-184.
- [28] 陈荣卓, 李梦兰, 马豪豪.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村规民约: 现代转型与发展进路——基于“2019年全国优秀村规民约”的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21(5): 23-36.
- [29] 高森. 基于AGIL模型的村务监督有效性研究——以“后陈经验”为例[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 18(3): 109-117.

责任编辑: 曾凡盛